

中国女性的 过去、现在与未来

CHINESE WOME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郑必俊
陶洁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女性的 过去、现在与未来

郑必俊 陶洁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女性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郑必俊,陶洁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6

ISBN 7 - 301 - 08586 - 9

I. 中… II. ①郑… ②陶… III. 妇女—概况—中国—文集
IV. D44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0081 号

书 名：中国女性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著作责任者：郑必俊 陶 洁 主编

责任编辑：刘 爽

标 准 书 号：ISBN 7 - 301 - 08586 - 9/G · 1437

出 版 发 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cbs.pku.edu.cn>

电 子 邮 箱：zbing@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7

排 版 者：北京华伦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者：河南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 20.75 印张 350 千字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序

《中国女性的过去、现在与未来》(*Holding Up Half the Sky—Chinese Wome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论文集(英文版)已于2004年4月由美国女性主义出版社(The Feminist Press at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在美国出版。这本论文集是应美国女性主义出版社的要求而写的。该社原社长 Florence Howe 女士认为,近年来中国女性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其中有些专家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女性研究最早的拓荒者、奠基人,她们成绩卓著,硕果累累,希望通过该论文集的出版,能够使国外,主要是美国对中国女性与女性研究的了解有所帮助。我和北京大学英语系陶洁教授深感这样的一项工作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十分有意义的事情,于是就邀请女性研究方面的有关专家教授共同撰写此书。该书作者全部为女性,其中不乏国内外著名学者,她们都热情接受邀请,所供文章也是在多年进行科学的研究,查阅收集众多古今文献,反复进行社会调查,掌握大量第一手数据资料,坚持数年教学、工作实践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精品。从开始组织撰写到翻译定稿出版前后历时三年,共刊出论文21篇(其中1篇为外籍华人专家教授所写),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的相关学科很广,包括女性历史、文学、教育、政治、社会、职业、婚姻、家庭、传媒等许多方面;时间跨度也很大,古今上下数千年,其中又以当代社会女性现实问题研究为主。由于文章需要面向国外,主要是美国的广大读者,而他们往往可能是第一次接触到有关中国女性研究的书籍,因此我们在组稿时要求作者必须考虑到对象的实际情况,材料不一定都是第一次面世,但务求综合全面,能够代表作者的研究水平,文字则要求平实简练,易于理解和翻译。在作者们的大力支持和共同努力下,稿件确实达到了预期要求。现在承蒙北京大学出版社将该书以中文出版,我们感到十分高兴。尽管这本论文集最初动议主要是为美国读者而写,出版后获得好评,已成为一些大学女性研究、东亚研究,主要是中国历史课程的参考书,实际上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也是有价值的,因为

所载论文的第一文字是中文，无需经过翻译，所以更便于阅读。在这里我们对全体作者和美国女性主义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当代的女性研究与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同步。二十多年来参加女性研究人数之多，涉及学科范围之广，发展之迅速，影响之大，确是人们始料所不及的。尽管至今它尚未进入主流学科，却已成为一片欣欣向荣的学术研究领域，并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多样的实践性。看到今天百花盛开的女性研究园地，回顾当年和许多志同道合的研究者共同走过的历程，我在欣喜之余也确有一些感想。

女性研究的对象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现在经过各自在自己的园地里反复耕耘，不断探索、实践，对于女性研究对象的认识则已日渐形成一些理性的共识。实际上，对于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来说，各有各的理解、做法，甚至语言表述上都有所差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不但是正常的，而且是不可缺少的。女性研究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人类社会既有它的共性，女性研究的共性与共鸣就是必然的。但世界又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一种认识问题的方法……所以就应当充分尊重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以至于各自研究特点的客观存在，女性研究的生命力也恰恰在于它的多样性的共存与互补。我们这本论文集总的来说是立足于本土研究，植根于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同时又是非常个性化的，各有自己的指导思想与研究方法。我们与美国女性主义出版社的共识与合作也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点上。现在，我想借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中文论文集的机会，再来谈谈我对女性研究的一些问题的认识。

结合我这些年对中国女性史主要是古代女性史的研究过程来说，我认为女性研究、社会性别研究、人的研究是同时存在的，在研究中又往往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女性研究首先就是要研究人类中的特殊群体——女性。具体来说，这类研究可分为两个方面：(1) 自然的人中之女人。女人与男人同为人，但女性作为自然的人，其生理特点有别于男人，因此就要从女性自身入手，研究其生理、心理、性格等特点，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女性特殊问题。女性的自然属性较早地成为科学的研究对象，如女性生理学等。女性的自然属性问题是一个永恒的研究课题，这是谁都不曾置疑过的。(2) 社会的人中之女人。女性与男性同为社会的

人,由于受到与男人不完全相同的社会条件的制约,女人的生存发展条件就有别于男人,所以我们需要从客观的社会存在入手,利用现有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以至某些自然科学,研究女性及其与外涉诸方面的关系(如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教育、法律、婚姻、家庭、人口等等)真实地再现她们的社会地位、生存状况、特殊需求,以及作为人类一半的女性群体是如何以其实践活动推动着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不断地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也就是说,对女性的综合研究与分科研究也应该是永恒的课题。过去对于这个问题却置若罔闻,即使有人提出要求,也常常惹来质疑的眼光,似乎这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现在取得的女性研究成果已经表明,各相关学科中的女性研究不仅不是庸人自扰,而且是完全必要。还需引起注意的是,社会的“人”本是由男女两性组成,他们共同创造人类文明的事实原本是客观存在,这里提出的女性问题研究却有它的特殊针对性,这是因为千百年来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造成了女性在“历史中的缺席”。它既埋没了女性的才华,又尘封了女性的贡献,更表明了对女性的歧视。女性问题研究的提出,不只是学科发展的客观要求,其中还有一个需要,那就是为了拨乱反正,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进而使女性得到公平、公正、合理的待遇。所以可以说现阶段这一类的女性研究,是针对以男性为中心的历史与社会中出现的对女性的种种不公而产生的批判性研究。这类研究与总体的各个门类的女性研究是一致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建立关于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这本论文集正是集多学科女性研究成果的一种展示。

从上述要求来看,当代女性研究应该说是刚刚开始,方兴未艾,任重道远。以中国女性历史研究为例,通过教学与研究,使我认识到,中国女性历史研究既是女性学科也是历史学科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属于人文科学也就是基础学科的一个组成部分。女性史学科的建立必须要经过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史学体系逐步向女性史学体系,最终当然是要向包括男女两性的中国史学体系的转换过程。这其中涉及研究内容、研究领域的转换,首当其冲的是关于研究对象的转换问题。所谓“以男性为中心”的史学体系是指在男性为中心的前提下,以政治、经济制度,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反映这些制度和事件的思想、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和专业目标的历史学。而女性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应是人类中的特殊群体——女性。从理论体系来看,它的前提或出发点、落脚点都应该是女性。应该说,不论男

人还是女人都是在一定的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环境中创造历史的，研究女性史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史料的收集、整理，真实地再现女性的社会地位、生存状况，以及作为人类一半的女性群体是怎样以其实践活动推动着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不断地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这是针对过去以男性为中心的史学体系中忽视了女性同是创造历史的主体这一基本事实，而不只是站在狭隘的立场上去为女性正名，更不是认为女性应该抛开男性去建立独自存在的历史。不过，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不可否认地就包含了对原有的“男性为中心”的史学体系的批判。

基于研究对象转换的要求，如何对待原有史书中的一些内容，就成为建立女性史学体系的突出问题了。男女两性共同创造历史本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在历代学问家所编写的各类书籍中却对其中的一半人——女性往往视而不见，竟然使中国历史舞台上本来始终在场的重要角色硬是变成了缺席，或是虽令其出席却搞得面目全非。于是女性史学的内容就不应只是运用简单的加减法，即在原有那些书籍中仅就资料加以取舍编排所能奏效，而必须站在人的、两性发展史的高度去重新审视鉴定之。这不仅要求我们要跳出传统史学的框框，从更广阔的领域着眼去寻找材料，而且还要独具慧眼发掘出真正有用的材料。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说是要创建中国两性史，偏又要绕个弯子说是女性史呢？这是因为，一方面男女两性是创造人类历史的主体，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女性主体这一部分作用被抹杀的现实，它反映的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种历史文化传统价值结构的思维定式。当我们要求真实地再现女性创造历史的足迹时，就必须用一种新的眼光、新的角度去解析原来赋予这种价值结构的“合理性”，才能揭示出性别歧视的真正原因，也才能够客观、准确、全面，即科学地把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女性历史还原出来。由此可见，女性研究离不开社会性别问题的研究，这两者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又都是和人学问题研究分不开的。

人学理论是涵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以及若干自然科学的基本理论的综合问题。人怎样认识自己、怎样做人，这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认识自然和社会更加复杂和困难。这里所谈的不是抽象的人，而是指如何建立关于现实的人（包括两性）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使人们能够更加全面、更加科学地对人自己有真理性的认识。研究领域的转换，是研究对象、研究内容转换的必然要求。随着研究对象与内容的

转换,以一种什么样的理论框架去突破原有的历史文化价值结构呢?我认为它的理论思想核心应该首先是从“人”出发,以人学的理论架构来指导女性研究或社会性别研究。尽管人学理论也尚处于建立发展阶段,但并不妨碍我们以这种思想为指导。这里所说的“人”不应该是抽象的,而是现实的人、具体的人、包含男女两性的“人”。正缘于此,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际关系、人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性、人的价值、人生价值和人性等一系列围绕“人”的问题,以及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等问题就都应包括在我们所涉及的研究领域之中。以此为准则所建立的理论架构,就不仅是对原有史学领域的某些拓展,而是必然涉及研究领域的转换了。上述三个方面的转换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在研究领域转换过程中,女性研究、社会性别研究、人学研究贯穿于其中,同时又不断地推动、实现着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的转换,其中也包括史学理念和方法论的转变。

仅就个人研究过程的这点体会就可以发现,女性历史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与研究领域的转换已经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而女性研究是一个新的、极其广泛的研究领域,女性历史研究还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的分支。可见一个新的学科领域的建立,绝不可能一蹴而就,是需要经过长期的积累、若干代人的辛勤劳动、坚持不懈的奋斗方能取得成功的。记得在北京大学的一次女性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曾比喻说,如果说中国传统史学是一棵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那么,女性史学还只是刚刚破土而出的小芽。实际上其他女性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不过现在目标已经越来越明确,队伍越来越扩大,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取得的支持也越来越有力,我们对发展前景应该充满信心。

这里我还想谈谈关于女性研究的开放性问题。首先,从学科发展来看,女性研究既是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每个学科又需要运用多学科的知识进行研究,从这两方面来说,这个新兴学科的跨学科性就决定了它的学术发展必须是开放性的,也就是需要在多学科中生根并博采众学科之养分作为一己之需。其次,从世界范围来看,女性与女性研究问题有许多共性,只有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开阔眼界、增强活力,才有可能不新地繁荣、发展、前进。中国的女性研究及学科建设应该说是我国改革开放,面向世界,主要是向西方学习的产物。这里特别要提到关于学科建设的问题,当女性研究与教学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如果没有女性学的学科

建设,就不能向主流学科迈进,无论是教学、研究,还是人才培养都将难以维继。国外主要是西方一些国家的女性学学科建设起步较早,大学普遍设有女性学课程,可以授予女性学专业的硕士、博士学位的学校也不少。亚洲国家如韩国、日本早在六七十年代已经有了当代意义的女性研究,她们一般都设立了实体的女性研究所,开设了一系列女性学课程,并能授予女性学硕士、博士学位。这些国家的女性学学科建设的经验都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我和陶洁教授曾访问过欧洲4国(荷兰、德国、丹麦、瑞典),考察女性学学科建设问题。在60—70年代欧洲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女性研究与女性学学科已经进入了稳定发展时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迈入学科的主流。各大学都已经有了女性研究课程,并有授予女性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权利。各大学的课程虽各有特色,而在多学科齐头并进中,跨学科性(文科、理工科、语言科)的交叉、综合研究恰恰是体现了女性研究学科本质的特点。特别值得学习的是她们在大学内部、大学之间教学上的相互合作,课程上的优势互补已经成为必须,有些课程还可在校际间共选。从她们的介绍中,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女性学学科化是需要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的。如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在致力于女性学向有关学科渗透方面做了长期的、大量的工作之后,终于有一百多位获博士学位的教师的研究方向与女性研究有关,并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师资队伍。隆德大学为了提高教师的性别研究意识,还有专门给教师开设的女性研究课程,并要求听课者男女各半。经过10年的努力,该校领导才同意将一门女性研究课程作为学生的主修课。在访问过程中,我们也向这些学校的同行以及妇女博物馆、资料馆、妇女维权组织等社会上的一些机构介绍了中国妇女、妇女研究和女性学学科建设的现状,她们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兴趣,认为有许多值得她们学习借鉴的地方。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信息化、网络化时代,提高外语水平,加强外国著作、资料的双向翻译、出版工作以及学科建设工作经验交流,是中国与世界女性研究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需要。现在“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句话,已经不只是属于中国的,而且成为世界妇女的通用语言了。《中国女性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英文与中文论文集的出版,正是在中外女性研究交流与合作方面又迈出的可喜一步。

对于中国女性的研究,它的对象就不仅是一般女性,而是女性中的特殊群体——中国女性。怎样去认识中国女性,怎样历史地、全面地认识中

国女性，这是中国乃至世界研究中国女性的一大课题。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并不会因为我们自己是中国女性就具有天然的优越性或是能够找到什么捷径，老实说在这个领域中我们并不是先行者，所以只有老老实实地运用多学科的知识进行多方面地、反复地、一点一滴地科学的研究，才是惟一正确的态度。对于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伟大民族，中国是世界上惟一的延绵五千多年的文明古国，长期以来我对中国古代女性的认识是停留在“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的理论观念定位上。1990年春，我开设的“中国古代妇女史”专题课程，主要内容就是以中国封建时代的妇女作为研究对象，以儒学礼教中妇女观的发展演变作为思想主线，从秦汉以降儒学礼教对妇女行为的规范到明代理学“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贞节观念的强化，来看中国古代社会妇女地位与生存状况，其结果当然可能是“瞎子摸象”，以偏概全。这在开始研究阶段几乎又是不可避免的。究其根源主要是受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批判孔孟之道的影响。当然，从对中国传统文化应持“扬弃”态度来看，反传统在现代化启动阶段是完全必要的，对于中国古代妇女所受的束缚从思想观念上进行清理也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作为一个国家民族精神遗产的传统文化，既不可能彻底割断，也不可能全部抛弃，当然也不应全盘肯定，而必须采取“扬弃”的正确态度，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于是我的研究工作也就逐步过渡到第二阶段，即考察中国传统与与中国妇女历史的关系问题上，进而形成了我对中国古代妇女立世精神的几点思考。

通过对中国历史、哲学、文学等学科有关书籍、资料的学习掌握，首先呈现在我面前的是，社会是人活动的领域，人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从事历史活动的，历史是人创造的。这是对社会历史的第一印象。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人对创造历史都做出过贡献呢？这就对社会历史发展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只有到人们所处的具体的社会环境、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中去找寻答案。通过考察中国传统与与中国古代妇女历史的关系这一问题，使我看到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决不仅仅是由男性所创造，而是由中华儿女共同创造的。中国古代妇女的生存方式、精神状态不仅只是受到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的影响，她们的立世精神是中华优秀文化滋养的结果。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 从属的身份与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2. 卑下的地位与对独立人格幸福生活的执着追求；

3. 外在要求她们柔弱与其坚忍不拔、刚强不屈的内在精神。

结合具体历史情况还可以看到，传统文化的积极进步方面与消极落后方面，对不同历史阶段，不同阶级、阶层，不同地区、民族以及不同人群中的妇女，其影响的侧重点是不完全相同的。到了中国近代，戊戌维新运动触动了传统文化的经典（经学）核心（三纲五常），具有两千年权威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受到了直接的挑战。在近代东西文化交流碰撞的过程中，东方国家也普遍出现了与传统文化离异并趋向西方近代文明的潮流，这就是所谓的“西学东渐”。戊戌时期的妇女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妇女运动的开端，是在“西学东渐”形势下中西文化碰撞交融中发展起来的。妇女在中国近现代革命中所显示的勇敢、智慧，做出的牺牲、贡献，正是在继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西方近代先进文明，冲破封建束缚，东西文化交融的结果。

对于中国女性的研究尤其是当代中国女性的研究，是一项十分庞大、繁重而艰巨的任务。此项研究已经在世界范围引起关注，一些国家的学者对中国女性的研究是相当深入的。这本英文版论文集出版后，美国一些大学已将其列为女性研究和东亚研究教材，一些国外的华人不满足于只看英文版本，还想直接看到这本论文集的中文版本，现在能够再将这份成果以中文展现在世人面前是令人高兴的。今后，我们作为中国的女性研究工作者只有更加努力工作，科学地总结过去，立足现在，放眼未来，做好这个既有学术意义更有现实意义的时代大课题，不辱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郑必俊
2004年8月于北京

目 录

中国古代妇女历史与文学

- | | |
|--------------------|---------|
| 古典新义：班昭与《女诫》在晚清的歧义 | 夏晓虹(3) |
| 唐代女性诗歌创作的主要特点 | |
| ——以女冠诗与娼妓诗为中心 | 刘宁(14) |
| 宋代妇女角色的时代特点 | 郑必俊(32) |
| 从京剧看中国女性的地位 | 黄育馥(53) |
| 东方女权抗争的女书模式 | |
| ——兼与自梳女、惠安女的比较研究 | 赵丽明(62) |

中国妇女与中国的变迁

- | | |
|-------------------|----------|
| 20世纪初中国女性的觉醒与妇女运动 | 吕美颐(81) |
| 长征前后的中国妇女运动 | 李萧虹(94) |
| 中国妇女参政的历史和现状 | 王庆淑(114) |

妇女的教育

- | | |
|--------------------------|-------------|
| 中国高等教育的结构调整和女性高等教育 | 马万华(131) |
| 探索妇女/性别研究与高等教育共同发展的新路子 | |
| ——中国(大连)个案：“科/教/师/生/校/社” | |
| 合作互动 | 李小江(143) |
| 少年儿童教育和健康状况的性别差异 | 郑真真 张妍(159) |

婚姻与家庭

- | | |
|-------------------|----------|
| 《婚姻法》与中国妇女的婚姻家庭权利 | 陈明侠(175) |
| 中国妇女的婚姻家庭地位 | 熊郁(189) |
| 家庭暴力在中国 | 王行娟(199) |
| 中国城市老年妇女生活特点与需求 | 刘英(214) |

妇女与就业

- 两种体制下的中国城市妇女就业 蒋永萍(229)
农村妇女通向管理者之路 金一虹(241)
从一个实例看中国西部贫困地区妇女的发展 韩嘉玲(260)
家庭策略,还是个人自主?
——农村劳动力外出决策模式的性别分析 谭 深(268)

妇女与未来

- 剖析电视女性栏目《半边天》 寿沅君(285)

妇女运动百年大事摘要

- 妇女运动百年大事摘要 曲 变(303)

中国古代妇女
历史与文学

古典新义： 班昭与《女诫》在晚清的歧义

夏晓虹

晚清作为中国社会的过渡时代，旧纲维日趋解体，新秩序尚未确立，思想界因而拥有空前广大的言说空间。历史上被尊为“经典”的权威著作与典范人物，此时也多半予以重新评价。在这种“古典新义”的表达中，其实蕴涵着解读群体的现实关怀。对东汉女子班昭及其所著《女诫》迥异于传统的不同阐释，正是在此背景下产生。

一、史书中的班昭与《女诫》

班昭在中国历史上已算极为少见的知名度极高的女性。史书中对班昭的记载，以范晔《后汉书·列女传》所述最权威。传文不长，其主要事迹可节引如下：

扶风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学高才。世叔早卒，有节行法度。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臧书阁踵而成之。帝数召入官，令皇后诸贵人师事焉，号曰大家。每有贡献异物，辄诏大家作赋颂。及邓太后临朝，与闻政事。……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后又诏融兄续继昭成之。……作《女诫》七篇，有助内训。……昭年七十余卒，皇太后素服举哀，使者监护丧事。所著……凡十六篇，子妇丁氏为撰集之。

在多半两三百字便道尽生平的《列女传》中，录入《女诫》七篇的班昭传已属格外显眼。

而本传中，《女诫》所占篇幅三倍于叙述生平。若无此一篇传世之文，班昭与入传的其他女子原可作等量观。换言之，著作《女诫》实为班昭平

生最重要的事迹。《女诫》除序外，七篇的目次如下：卑弱第一，夫妇第二，敬慎第三，妇行第四，专心第五，曲从第六，和叔妹第七。只看标题，即可知其说以“妇德”为本，在人伦关系上，要求女子处处和顺。在男权中心的中国传统社会，《女诫》因此被规定为女性的必读书。班昭在古代与近代社会中天差地别的升降、褒贬，于是都与《女诫》相关。

此外，在《后汉书·班超传》中也述及，班昭曾因其兄久戍西域，年近七十，尚不得归，而上书汉和帝。“书奏，帝感其言，乃征超还。”这篇文字后人题作《为兄超求代书》。

综上而言，班昭之得以青史留名，全离不开文才。其一生大事为后人最津津乐道者有三，即续《汉书》、教授后妃与撰《女诫》。在价值观开始转变的晚清，其是非功过的评说皆由此引发。

二、女子教育的楷模

对班昭与《女诫》的重新阐释，肇端于女子社会化教育开始在中国创兴之时。1897年11月，上海的维新人士正式集议筹备女学堂。次年5月底，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影响广远的女子学校——中国女学堂在上海诞生。同年7月24日，由中国女学堂的女教员与女董事创办的《女学报》出刊。该报的特异处在“主笔人等皆以女士为之”，故舆论界称其“实开古今风气之先焉”^①。而《女学报》登报公聘的主笔中，高居榜首的乃是薛绍徽与裘毓芳^②。二人对班昭与《女诫》不约而同的关注均出现于此时，当非偶然。

《女学堂试办略章》在1897年11月18日的上海《新闻报》首刊后，薛绍徽很快写作了《创设女学堂条议》^③，首先对《略章》第一条表示异议。原章文曰：“学堂之设，悉遵吾儒圣教，堂中亦供奉至圣先师神位。”薛氏为彰显女子学校的特色，而提议以班昭代替孔子，理由是：班昭“续成《汉书》，教授六宫，其德其学，足为千古表率；又有《女诫》、《女训》（按：《女训》

① 《女学开报》，上海《新闻报》1898年7月30日。

② 见上海《女学报》(Chinese Girl's Progress)第一期(1898年7月24日)报头“本报主笔”18人名单。

③ 薛绍徽：《创设女学堂条议并叙》，上海《求是报》(International Review)9—10册，1897年12月。